

召南詩的時代問題

高 葆 光

詩經召南十四篇詩，古今經學家多以為是召公所採的。召公採詩的時代，却衆說紛紜。鄭康成詩箋，孔穎達正義均以爲文王徙都於豐，分岐故地爲周公且召公奭的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至於武王之世，乃採其詩，被之管弦。朱子詩集傳大略採用這個說法；不過以爲在成王時，始行採取這些詩。因此前儒大多數認爲這些詩，是作在文王時代。

王符潛夫論班祿篇說「背宗族而采蘩怨」顯見以采蘩係周衰敗時的詩。鄭樵六經輿論，王質詩總聞也說何必禮矣爲東遷時詩。崔述讀風偶識，更以爲這些詩未必作於文王時代。他並且說周召二公至武王世始顯，至成王時始分陝而治；所以這些詩裏有成康時所作，也有東遷以後的詩。他們雖對於前儒舉出叛旗；但尙未將召南全部詩歌，推落到宣王以後。

近人如陸侃如詩史，以如召伯與召公截然二人。甘棠詩中的召伯與黍苗崧高同指召虎。何必禮矣章當作於前八世紀末年。他又斷言：「二南中不但沒有一篇可以證明是文王時詩，並且沒有一篇，可以證明是西周時詩；同時時代可以推定的幾篇，却全是東周時的作品。」

近儒如傅斯年先生等又申明此說，舉出若干證例，竟於數千年後，將前儒傳說一概推翻，判斷召南全部詩，都在周宣王時，或以後所創造的。他們的理論大概如下：（見周頌說及詩經釋義所引）

（一）以地望上觀察：

召南是召穆公虎，所統轄的南國。十四篇詩言地望者，則有江汜，證以江漢之詩，知其地望，南至長江。周初邊界，不能至此。

召南詩的時代問題

召南詩的時代問題

一八六

(二) 甘棠的詩言召伯。經籍中於召伯虎或稱公，而絕無稱召公奭爲伯者。召伯之稱，又見于小雅黍苗及大雅嵩高，皆謂召伯虎；而大雅江漢之篇於虎則曰召虎，於奭則曰召公，區別甚明，故舊以此詩爲美召公奭者非是。

(三) 何彼禴矣一詩，稱平王，即周平王。以此推論，其他的詩，當上不在宣王以前，遲者及於春秋初葉。以上三個論證，似有理由；但細細研求，他們的根據，仍有極端薄弱之處。難以成立。

(1) 地望言之，周初的政治及文化勢力是否波及長江。

依近代人的說法，周初邊界，其南端僅至河南中部，及安徽北部。絕沒到達湖北。因爲周初人只靠黃河沿岸發展，故未南下。我嘗懷疑周人由西向東發展已經到達東海，何嫌何疑，而竟不敢南窺？固然楚人新興，羣蠻未服；但以滅殷勝奄之威，何攻不克？蠢爾蠻荆，焉能阻我牧馬？吾依群書及金文攷證，方知周初威力已及江淮；只以史籍缺失，故掩而不彰罷了！史記楚世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語右尹子革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史傳所載相似，當非虛語。又考孟子滕文公篇許行章余豈好辯章兩引詩經魯頌閟宮「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句。閟宮世傳爲美僖公同齊桓伐楚之作，但孟子何故竟指爲周公之政績？吳其昌金文歷朔疏證，以爲周公二字乃指周公子明保；但考孟子上下文意，仍應指周公且，不應指其子。焦循孟子正義引翟灝四書考異云：

「詩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止陳姜嫄后稷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未暇序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尙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

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指為周公。」翟氏之說與趙岐注，同指周公懲擊荆楚。是成王時代確實征討過楚。周初的威力已及彼方。

再以金文考之，更可證明上說屬實。

中鼎二中鼎三「佳王命南宮伐反鬻（虎，荆）方之年，王命中先省南或（國）鬻行，玁（虢）王（居）。」

中甗：「王命中先省南或（國）鬻行，玁在由。」

此三器兩周金文大系及吳其昌金文曆朔疏證皆認為在成王時。虎方即楚。鬻，金文大系以為即庸字，吳以為即奄字。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伯鼎跋考定庸即奄。吳氏以為在魯之奄即今之曲阜。在楚之奄，即庸或上庸，即今湖北竹山縣上庸城。此器明言伐虎方等語，可知周初政治威力已及江淮。

又禽啟：

王伐樊（楚）戾，周公某（禡）禽祝（祝）禽又（有）岐祝。王易（錫）金百孚。（錡，金量之單位）禽用乍（作）甗（寶）彝。

此器未鑄年月。吳其昌金文曆朔疏證，以為周昭王十年伐楚，周公為周公旦之子明保，禽為太祝禽，非伯禽。兩周金文大系列為成王時器。周公即周公旦，禽即伯禽。兩周金文大系說較長。因為明保，金器時稱明公；而明公啟又稱明公為魯侯，當為伯禽。伯禽卒於康王時（帝王世紀），那麼此器應在成王時無疑。吳說以三統曆推算周曆，諒不可信。總之此器無論在周成王或昭王時，均去宣王很遠，可見周初政治勢力已遠及江淮。

此外昭王曾有伐楚一段事實。史記周本紀：「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正義引帝王世紀：「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呂氏春秋古樂篇亦載此事，其辭大同小異。左傳僖公四年齊桓伐楚，曾以此責楚。初學記七引古本竹書紀年：

召南詩的時代問題

一八八

「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漢遇大兕，」又「十九年天大曠，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

準此昭王南征，似乎失敗。但據楚辭及金文考證，確實得着空前勝利。

楚辭天問說：「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金文宗周鐘：

「王肇適省文，武，董（勳）彊（彊）土。南或（國）服（服）勳（子）敢召（陷）虐我土！王章（敦）伐其至，戮（撲）伐毕（厥）都。畢迺迺遣間來逆邵（昭）王，南尸（夷）東尸具見，廿又六邦。……歆其萬季，眈（變）保二二（四）或。」

南國同南夷即楚。邵孫詒讓以爲紹字，訓相導，非是。昭，古金文中全用邵字，如宗周鐘「用邵各不顯且考先王。」刺鼎「晉邵王」周公設「邵朕福血」邵即昭字。頌鼎「康邵宮」即康昭宮。周禮小史「奠世繫，辨昭穆，釋文「昭或作紀」。故金文大系及金文曆朔疏證，均以爲邵王即昭王。昭王爲生時尊號，非死諡。（觀堂集林金文叢攷）歆，吳其昌及某氏均以爲昭王名，西周諸王尚無諱名之制。可見昭王南征，竟有征服廿六邦的偉績。又迺伯彝：

「迺白（伯）從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宗室寶障彝。」

鼎設：

「鼎從王伐荆，孚，用作饌設。」彝彝：

「彝駿，從王南征，伐荆楚。又（有）得。用作父戊寶障彝。」罔俗設：

「王征楸（楚）錫罔俗貝朋，用作朕彝（京）且缶（寶）尊彝。」

迺白，鼎，彝駿，罔俗，都是昭王之將率，從征荆楚，亦獲得許多金屬及其他物資，用作尊彝等器，以銘盛功。足證昭王伐楚曾經勝利；所以才有勒功金石，以資慶祝的盛舉。而宗周鐘所記又足與屈原天問所說「南土爰底」，互相證明。楚辭及金文所記，所以與史記等書有所出入者，或因昭王兩次伐楚，如真本竹書紀年所說一在昭

王十六年，一在十九年。史記所記殆指十九年之役；而楚辭及金文所記當在十六年。其間傳聞異辭，故有獲雉遇咒的不同小事。周共和以前的年代，史記三代世表，已經缺疑。後人雜探他籍，或以三統曆推證，均難成信史。世遠年湮，吾人雖然不能算出昭王距宣王的確實年數；但中經穆、恭、懿、孝、夷、厲、諸王，知道昭宣二王相去已遠。吾人由典籍及金文中已查知昭王的政治力量遠達於楚。楚地的詩歌或為周人採來，或自動流入中原，均在情理之中。因此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有汜各詩，自不容置疑。至於宣王時召虎平定淮夷，經營江漢，不過恢復周公之舊宇。魯頌僖公征楚之功而曰：「復周公之宇」，可見周公舊宇已拓至江淮。吾人居數千載後，似難否定前儒合理的成說，而將召南全部詩下移宣王時代。

再就周人文化的力量觀察，也有遠及江淮的可能。因為政治的侵略（包括軍事經濟）是有形的；而文化的侵略是無形的。有形的侵略，容易為人察覺，而有所防備；至於無形的侵略，却在人不知不覺之中，很能順利地浸透。尤其是優越的文化，自然地可以渡過國境的限制，而向低落文化區域灌注，發生同化作用。周人文化在文王時已經相當地發展。這種文化當時由西方岐山不斷向東南流去，是事所必然。不過殷人固有的文化，亦不低於周。周人向東侵入的文化自必受有相當的阻碍；所以勢須藉用政治力量，然後才能闖入。至於楚，乃文化落後的區域，自易浸潤。尤其在武王成王安定全華以後，周人南下的文化，經汝漢，到達長江，更勢如滔天巨浪，澎湃奔騰，不是楚人任何勢力所能阻遏。楚世家記載熊渠的話，他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他雖極欲避免中國的號諡；但也可見周人文化已經進入。除號諡外，其他的國家社會上各種制度道德，仍不免沾染周文化的成份。周南裏江漢汝墳，宛然中土人的思想；而召南裏的江有汜（召南裏的詩不全是南國人所唱；只此一篇，在形式上可以確認是產於楚地。崔述已經說及。）因為句法章法完全與周初詩相類，是簡單樸素，毫無文飾。同時詩的內容是敘說嫡媵關係的情事，周初宗法社會盛行時也能產生此詩。（齊詩以此詩為南國人士求長女，女家以次女子之；其後長女反嫁醜惡，乃作詩以悔之。與詩意不合。近儒改為男子失戀的

召南詩的時代問題

一九〇

詩，也與原詩以江汜起興不符。衛序邇毛意以爲嬌出嫁，不以媵備數；媵却能勞而不怨，作詩以美之，仍與詩意相反。余以爲此詩內所說乃係媵女怨其嫡，不能備數，並無勞而不怨的口氣。正是宗法社會一夫多妻制度下，女人們並無自覺心理，而有爭寵分榮的思想。）可見周初楚地人民也能效法周人的詩歌體製，而唱出相似的心聲。前儒言文王之化，被及南國，不全是附會之談。吾人又未可斷定，必須等待周宣王時，召虎經營江漢以後，才能產生這類的詩。（文王之化被於南國，不一定南國的詩，全在文王時代。前儒對於此點，多有誤會；故謂二南的詩，全是文王時所作。今人陸侃如詩史竟謂「文王之化被於南國是不通的」，這也是誤認教化的推行，與作詩的時代，爲一個命題。）

(2) 甘棠詩內稱召伯的問題：前儒皆言此詩是歌詠召公爽的。史記燕世家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法言先知篇，白虎通義封公侯篇及巡守篇亦同，此皆今文家所說，與毛傳古文說不異。崔述以爲召康公歿於康王時代，此詩是作於召公死後，已將時代推後。朱右曾詩地理微，也說此詩蓋在召穆以後。陸侃如詩史乃昌言此詩之召伯，乃指宣王時征南淮夷之召穆公虎。近儒更謂召虎稱伯，召康公稱公此詩稱召伯，定指召虎。這些爭端，全起於伯字。伯字的意義倒是什麼？按伯之本字爲白，甲骨鐘鼎作𠄎，其義爲大拇指，上象爪，下象指紋。說文：「伯，長也。」乃其引申義。因伯爲大拇指，引申爲一切長的稱呼。此詩言召伯可能是下列三種不同意義之一：

(A) 二伯：史記燕世家：「其在成王，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樂書引樂記曰：「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劉向說苑貴德篇亦同此辭。史記的話，大概根據公羊傳的。公羊傳魯隱五年初獻六羽條說：「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又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方伯屬於二伯，外統於內。」孟子萬章篇

只言公侯伯子男五等，未嘗言二伯，是以後儒對於二伯之說多疑之。崔述且謂周公召公至武王之世始顯，文王不能分故國之地，以爲二公。（原文見讀風偶識）他疑召公歿于康王之世，此詩作于康昭之際。又說「豈必二伯，然後稱伯乎？」按王制爲孟子以後的書，固不待論。（盧植謂漢文帝時博士所作。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以盧爲妄，謂在赧王時。）若公羊高，殆春秋時人，公羊傳一書雖由其玄孫箸於竹帛，然前此口耳相傳，已爲大家所公習，其玄孫萬難擅自增改。公羊高去古較近，他的話，理應可信。況孟子已經聲明，「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又不宜以孟子之言，而疑二伯之制。本來周公爲相，召公爲太保，其地位崇高，明係九命作伯之伯。尚書顧命：「王出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亦可證周有二伯之制。崔述之言，僅能說明在文王時，周召二公不能分治；然不能證明武王後，無二伯之制。再召虎爲公爵；詩黍苗崧高却稱伯。召伯比稱虎爲召伯，載鼓稱爲穆公，史記周本紀及國語，亦稱爲召公。以公爵而稱作伯，或係二伯之故，因此百姓作詩時稱召公爲召伯，揆之事理，也有可能。

（B）諸侯的爵位，時有互稱：王國維古諸侯稱王說，已斷言「古者天澤之分未嚴」。某氏之金文叢攷，又例舉金文中，同係一人，有稱公，而又稱侯；有稱伯，而又稱公；有稱子，而又稱王；有稱伯，而又稱子等事實。按上說頗是。依詩經本身觀察，也有相類的情形。例如韓奕篇的韓侯，而詩中說：「因以其伯」。下泉篇的郇侯，而詩中說：「郇伯勞之」。南山篇的齊侯，而詩中說：「齊子由歸」。可見周時五爵之稱，並不如想像那樣嚴格畫分。因此甘棠一詩，本咏召公，如百姓呼之爲伯，也不算錯誤。

（E）普通官長的稱謂：白字之本義既訓大拇指，後人引申爲長，因作伯字，爲一切長的稱謂。方伯曰伯，州伯曰伯，天子的左右二老曰伯。天子對於同姓的諸侯，大邦曰伯，小邦曰叔。（見儀禮覲禮記曲禮）諸侯之間，同姓大國之君臣曰伯，小國者曰叔。（詩鹿邱）普通的官曰伯。（書立政之小伯尹伯，呂刑之官伯，多方之胥伯巷伯詩之巷伯。）夷狄之

召南詩的時代問題

一九二

長也稱伯。（寬尊「王姜命作冊巽安夷白」。）父之長兄曰伯，妻稱夫也稱伯。（詩伯兮章）可見伯字的涵義很廣。甘棠的召伯，可能是說召長官。因為百姓對於召公，未必認清他是什麼爵位，只管他叫某某長官，等於清時人民管所有的官都叫作大人一樣的道理。我看以上三種情形中，可能是長官的意義居多。如以此詩內有召伯二字，即斷定為詠召虎，而非頌召康公，未免誤會。

再我們用性質相同的詩，互相比較，也可以有個清楚的認識。例如：小雅的黍苗是歌詠召虎能勞民，大雅崧高是詠召虎助申城謝，江漢是詠召虎平淮夷。這三首都作于宣王之世。詩章較長，內容也較複雜。像甘棠詩，全篇只三章，意義相同；每章又只三句，簡單質樸異常。以文學上流變觀之，甘棠詩的產生應遠在黍苗崧高江漢詩以前。前儒以甘棠是詠召公奭的，必確有來源。

至於江漢詩是詩人描述宣王命令召虎的口吻，當然稱召虎的名，而不稱其爵；稱召虎死去的祖先以爵，而不以名，又未可以此，來證甘棠詩中的稱謂。

(3) 何必禮矣一詩的關係：召南詩裏何必禮矣一篇：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二句。毛傳說：「平，正也。武王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玄箴膏肓說：「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二說縱有不同；但均認平王二字係指文王。至鄭樵王質始謂平王即周平王。朱子從鄭說，而又游移其辭。崔述讀風偶識，更力證係指周平王。近人陸侃如詩史以此篇作在西前八世紀末年，大概係根據鄭王崔諸氏的說法。近儒亦同此辭，竟因此對於召南作於周初時代，下個完全否定的判斷。吾謂召南詩不作於文王時代，亦當在周初。此篇編在召南的後部，殆係後人加入的。絕不能因有此一篇較晚的詩，便將召南十四篇全部下移。如鷓巢采蘋采蘋三詩，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時用之。周公製定禮樂，在國家舉行典禮時，已經用此三詩，故三詩很早；絕不會在周宣王時始有之。（儀禮一書，歐陽修始疑之。姚際恆偽書考謂真偽參雜。崔述亦曾指摘。但此書多與其他經典相合；還有一部份體制，與金文不背。書或非周公

作；禮却是全周所行的。崔氏所指巨拜堂上一節，殆保晚周的禮法。不能以此而說全書是偽的。）又騶虞一篇，太平御覽樂部三引墨子三辯篇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鄒吾。吾虞古通。是此篇爲成王作，古人亦有定說。草蟲一篇，齊詩列在采蘋後，毛詩，列在采蘋前。采蘋爲周初時詩，草蟲也不應至宣王時始有之。其餘各篇，雖各詩內，並未記載是周初的作品，但也可以得到確實的旁證。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季札說：

「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

季札聽樂時是周召的全部，或一部，吾人固難知之；但「美哉始基之矣」，「勤而不怨」，一定指着周初建國時所作的好詩。「猶未也」一句話，我們也可以體會出周初建國時也有不好的詩。而「勤而不怨」一句話更明明可以包括小星一詩在內。（清儒葉酉詩經拾遺謂季禮觀樂所列諸國不可信，而斷左氏爲誣。前儒已力斥其謬。）呂氏春秋音初篇載侯人歌，始爲南音，而曰：「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雖指着音律講的；但有調必有詩，也可以證明召南裏的詩，當有作在周初時期的。是以召南的詩，除江有汜是南國的詩，何必農矣一篇，近儒大家公認爲東遷詩以外；其他各篇，吾人沒法斷定是周宣王時的詩。

再以詩的本身來觀察：鵲巢，是慶祝嫁女的詩。貴族嫁女，在周初，也有這樣的禮制。在這詩裏並無江淮等字眼；怎能說一定產生在召虎所統轄的南國？采芣是詠諸侯夫人祭祀的詩。用沼澗中的芣，來作祭品，是表示誠敬節儉的美德。正是盛世人們的思想，與後世以奢靡相尚者不同。應該是開國時的詩。草蟲，是婦人懷念征夫的詩。詩內明明指南山。像節南山的詩，所說的南山，都指終南山。顯係周人畿內的詩；也並不是南國的詩。（此點崔述已署提及）采蘋是咏祭祀的詩。他說南澗之濱，也並不專指南國之澗。甘棠詩，已如以前證明，也不能斷定在南國始有甘棠。行露，是女子拒婚的詩。前儒認爲女子爲室家之禮不備，故拒絕出嫁。崔述曾經疑之。吾謂女子拒婚是事實。至說「速我獄，室家不足」等話，也許女人許嫁以後，發覺男家種種不當；所以生出拒婚的舉動。並不一定如

召南詩的時代問題

一九四

今日隨便解除婚約那樣的輕率。此詩雖不能證明有什麼道德成份在內；但也不能說因有此一舉，便謂風俗偷薄，一定是宣王以後，周衰政弊，才有這種現象。也不能說此詩列在甘棠之後，即爲晚代時的詩。（崔述有此意見。）羔羊，前儒皆認爲是美官吏節儉正直。崔述譏爲大夫退食委蛇，優游自適，是周道漸衰，穆王以後所作。崔氏之言，亦殊武斷。這篇是咏大夫退朝後的態度，何所見他們在朝時不勤於職事？他們能否勤勉，也不應在大夫自得的面貌上察出。殷其雷，是婦人懷念征夫的詩。詩內提及南山，也是周人說終南山的慣語，並不是南國的詩。崔述說：「雖思念而無感傷之情，怨尤之語；則是婦人猶知大義，不至以私害公，即見先王之遺澤遙遠。……上距成康之世，猶未甚遠。」已與他說「甘棠以下八篇，皆昭王以後之詩」，有些衝突。更不能證明是宣王以後的詩。標有梅，是咏女子悔晚婚的詩。雖不能如衛序所說的「被文王之化男女及時」，朱傳所說的「女子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時」；但這種悔恨晚嫁的心情，何時無之？又怎見得是宣王以後的女子方有這種思想？嗚彼小星，韓詩外傳以爲勞於仕宦者之作，這句話太籠統。這詩明明說「抱衾與裯」，正是妾婦的口氣，毛詩舊說尙是。她爲人妾，不知抱怨，還說「實命不猶」。蓋因周初宗法社會業已建立。嫡妾地位分明。女人們認爲以妾事人是應該的。所以雖然勞苦，却自認天命。在這環境下，也能產生這樣的詩。不必等待宣王時，此種環境延續下，才有這樣歌咏。野有死麕是男女相悅的命。衛序所說被「文王之化，猶惡無禮」，固然是不對的。但這種現象那個時代，都可能發生。不必等待宣王以後才有。前儒有些人疑此詩時代較晚，完全站在道德立場評論。不知古今的社會是複雜的。怎見得文武成康的盛世，人人全是道貌儼然的聖賢；而沒有男女間的私情？又怎見得有一兩項男女相悅的詩，整個風俗即算敗壞？騶虞，毛傳說是仁獸，魯韓詩則以爲掌鳥獸之官。這是咏田獵的詩。編詩的人，是效法周南以麟趾作結束的辦法，用此詩殿在召南最後。我們無法辨明，此詩在周宣王時始有之。再在形式上觀察，上述各詩，都很簡單樸實，亦無特別粉飾文巧之處，我們也不能斷定是時代較晚的詩。怎能說召南裏邊沒有一首西周時的詩？

本來確定古詩的產生時期，是很難的一件事。古來的經典，其始多半是口耳相傳；至於著在竹帛，倒是後來才有的。尤其是民間的歌謠，鄉曲間的匹夫匹婦們，心有所感，口裏唱出幾句歌辭，流行以後，不知什麼時候，什麼人把它寫在竹帛上。後人對於創始時難知，對於寫在竹帛時易曉；因此往往誤認著在竹帛時，即為創作期間。這固然是一種誤會；但也可以說明古代社會流行的歌謠，有很多難以確定它的產生時期。尤其是古今歌謠的形式，很少像巷伯節南山那樣的詩，在文尾將作者標出。作者既不可知，當然作詩的時期，也難確定。又古來有一種習慣，創作詩歌，叫作「作」，（說文「作始也」。）唱前人的成詩，也叫「作」。（爾雅「作爲也」。）鄭樵劉師培（左廡卷二）曾經發現此種習慣。作字既有以上兩種用法，後人弄不清楚，又往往誤以歌詠的前詩，為歌詠者所創作；因此詩的產生時期，也必模糊。此外論定作詩的時期，又常觀察詩內所述的史實，及歌謠形式上的繁簡文質，而將時代加以劃分；但史實並不特殊，形式亦無顯別的詩，就很不容易下個正確的判斷。不得已的辦法，只有利用古人的傳說。他的傳說，如果合理，不與當時的思潮，環境及其他書籍矛盾，愈古愈有可信的價值。因為去古未遠的人所說合理的話，總比遠在數千年的我們，憑着殘缺不完的典籍，遙作臆斷，強得多多。如果發現他們的話不合理，又無他證可辯，也只好缺疑；似不必強不知以為知，以致厚誣古人。前儒以召南有周初的詩，因而漫謂召南全部詩，是作在文王時代；今人又以召南有東遷以後的詩，因而漫謂召南全部詩，是作在周宣王以後，他們在邏輯上同犯一種錯誤！我再攷今儒所以錯誤的主要原因，是錯認周初疆宇特別褊小。固然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話，是指着人心的歸附，不是說文王吞併這些土地。而江漢詩裏所稱：「于疆于理，至於南海。」等等話頭，不免有些誇大；但周初聲威教化，絕非僅僅停滯在黃河流域的一塊狹長方土地，可以斷言。只以史乘缺載，後人察考未精，致多方對於古人，加以懷疑。今儒既因有這種觀念橫於胸中，對於召南詩內遠方的詩歌，自然要將時代推落在後。我們今日須利用紙上的材料，與出土的金石材料，互相比較印證，不難確切地判斷召南裏邊的詩歌，大部是產生於周朝初

召南詩的時代問題

一九六

年。我們觀察這些詩，可以明瞭周初當時的社會真正情形，爲研究古代史者作一有力的資料。一方面又可獲知周初時文學的面貌，（其時間約在西元前一千一百年左右）足使文學人士，研究中國文學的發生演變時，得到一個可靠的史實；同時又可以效法詩經的文學技術。

THE DATE OF SHAO NAN SECTION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by

Kao Pao-Ku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召南詩的時代問題

The majority of the Confusian scholars dated the fourteen poems of the Shao Nan section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in the Early Chou period (probably Cen. 1100 B. C.) Modern scholars place them in the East Chou period (770 B. C. — 600 B. C.) or after the reign of King Hsüan of Chou (837 — 600 B. C.) This dating is based in three considerations:

1 The poem "Chiang Yen Fan" seems to be set in the Yangtze Valley. In the Early Chou period Chou strength did not reach to this area.

2 Earl Shao of the poem "Kan T'ang" indicates Shao Hu of King Hsüan's period.

3 "Ho Pi Nung Yi" is a poem dating from King P'ing of Chou.

Therefore the remaining thirteen poems cannot be dated as Early Chou.

My argument with the above is as follows:

1) From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from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we know that Kings Ch'eng and Chao of Chou sent an expedition against Ch'u which gained an early victory.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ure of Chou easily penetrated the undeveloped Ch'u territory. This strong Early Chou culture and political strength assimilated the native songs of the Yangtze Valley as it extended into that area.

2) The term "po tzu" in the "Kan T'ang" poem is an official term. The phrase "Shao po tzu" cannot only mean "Shao hu" but should also mean "Shao Kung Shih." Furthermore, the literary form of this poem is very simple, and certainly belongs to the Early Chou period.

3) Although the poem "Ho Pi Nung Yi" was written in the time

of King P'ing of Chou.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all the other thirteen were written in the East Chou period. According to an examination of the account in the "Wu Chi Chia section" of the "Tso Chuan" and a study of the poems themselves, most of the Shao Nan section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were written in Early Chou. These poems give us a glimpse of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Early Chou. The literary techniques and the successive changes in literary style of this period. This gives a great deal of comparative material for student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